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凡到过美国首都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座巍巍的华盛顿纪念碑；同时也会注意到，华盛顿市区跟其他大城市不一样，竟找不到什么摩天大楼。原来那里有一条规定，市内的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准超过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真的不能被超过吗 答案恐怕是“也许”。

美国革命元老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上曾发表书面演说道：世间有两种热烈爱好对人间事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雄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中之任何一爱就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干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把两者作为推动力而联结在一起，那么，它们就会对许许多多人产生最猛烈的效果。对这些人言，如果他们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带来荣誉，又会带来钱财，他们就会冒天之下大不韪去谋取这样一个位置。

华盛顿恰巧是跳出了富兰克林所划的这两个圈子的人。

在近代世界中，还没有找到任何掌有实权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华盛顿那样完完全全出于自愿和出于主动地急着要求退隐。

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曾说：“如果在历史献给最高贵最纯洁的政治家的纪念碑中，我见一座其高非别的所能伦比的，而且有人问我,谁最配得上这一无上的荣誉,那么,在过去 45 年中的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何时间,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人——华盛顿。”

热衷功名　无遑他顾

在美国与在世界各地一样有吹捧家。第一个为华盛顿作传记的人是一位牧师，名叫威姆斯。他的书再版了好几十次，这书最初的时候是一本薄书，最后却已成了一本厚书，因为每再版一次,威姆斯就加上一点新‘材料”。他所制造的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华盛顿在幼年时诚实无比，向父亲自报砍断了一株樱桃树。笔者在小学时代就从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读到过这个故事。但现代历史学家已证明威姆斯的好些故事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是事实。

1732 年 2 月 22 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波普斯溪，他是他父亲的续弦夫人的第一个儿子，他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父亲是一名庄园主,约拥有 1 万英亩土地。华盛顿 11 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由其兄劳伦斯当家。劳伦斯比乔治大 14 岁，很有当父辈的资格。更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间的关系竟非常融洽，这对乔治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乔治的两个哥哥都被送往英国留学。但乔治却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他甚至连本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都没有上，据说其原因是他母亲不愿让乔治离开自己身边。因此，他的文化程度，用中国标准来说，仅仅是初中水平。17 岁那年，乔治开始进入社会，充任了一名小小的土地测量员。但劳伦斯给他带来了机会。劳伦斯留学回国后在英国海军上将弗农的西印度海军中任上尉。由于崇拜弗农，劳伦斯就把自己的山庄取名为弗农山庄，又

译芒特弗农。

但劳伦斯不幸早逝，他留下遗嘱，规定把财产留给一名小孤儿,万一孤儿有不幸,则转给乔治。结果,劳伦斯死后不久,那婴孩也死了，乔治凭空获得了一大笔财产。

弗农山庄本来归嫂子所有，但嫂子再嫁，乔治乘机租用，后来又取得了全部主权，成为真正的弗农山庄主人。

不但如此，乔治还上书总督，要求继任劳伦斯的军衔，结果于 1752 年 11 月被任为弗吉尼亚民军少校，从此立志以军功来争取自己的前程。

18 世纪 50 年代，法国在美洲还有相当势力，法军派兵进占俄亥俄河流域，设立堡垒。弗吉尼亚副总督丁惠迪写了一封抗议信,华盛顿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送信。他带了一名响导,一名法语译员。这是非常艰苦的行程，天气又非常之坏。他经历了许多危难，终于把信交给了法国公牛堡垒的守军司令，并带了回信，返归威廉斯堡，又应丁惠迪之命，写了一个报告。丁惠迪将报告印行，在伦敦两个刊物上转载。于是，华盛顿为自己第一次建立了声名。

1754 年，丁惠迪下令组织一支人马赴俄亥俄地区防守边疆，他任命华盛顿为副司令，华盛顿带了约 150 人,从亚历山大出发，沿波托马克河而上，最后进入蒙诺加希拉荒凉地区，行程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前进，经大草原，到桂冠山脉，这时探子来报,附近有法军。第二天,华盛顿不经宣战,向法军偷袭,杀死敌军 10人,俘 20 人。适逢司令病逝，华盛顿立即晋升为上校。不久法军已准备好报仇，华盛顿把部队退至大草原，赶筑命运堡垒。法军大批涌至，把华盛顿团团包围。华盛顿只好挂白旗投降，且在投降书上签了名。

这里发生了一起翻译误会。法文原文指责对方谋杀了几名

法国人，但华盛顿的译员是荷兰人，他只有洋泾浜法语水平，所以把谋杀译为杀死。华盛顿当然没有发现问题。事后，法国人把法文投降书公诸于众，伦敦人士看到华盛顿竟承认谋杀，不胜气愤。但丁惠迪完全原谅华盛顿，他知道这事只能怪翻译，不能怪华盛顿。

1755 年，英国派布雷多克将军率正规军征讨法军及其印第安同盟。正规军不承认华盛顿的上校衔，所以他只以志愿军身份参加了布雷多克的参谋班子。布雷多克采用英军的正规进军方式，机械地行军。华盛顿提醒布雷多克应提防印第安人的偷袭，但布雷多克十分骄傲，他认为印第安人只能吓唬民军，他的正规军是不怕的。结果，果真中了埋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英军大败，布雷多克重伤损命，华盛顿也落得个死里逃生。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靠了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平安归来，的确是超乎人力之所能，出乎人们意料，因为我的外衣就被 4 发子弹穿透,我的坐骑有 2 匹被打死,在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的时候，我却安然无恙，说来真是太丢脸了，我们被一小批微不足道的敌人打败的。”

这次失败，华盛顿当然毫无责任，相反地，他却获得了英勇作战的美名。他回家后就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军总司令，时年 23 岁。

从信函中可以看出，青年华盛顿的生活中心就是想依靠军功,获得升迁。

1757 年,他上书丁惠迪说“我不否认我有缺点,也许有很多的缺点。如果我不自量地自认十全十美，那不但世人，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是虚浮浅薄的。不过有一点我知道，而且也最引以为慰的是，没有一个从事公职的人，能像我那般诚实地、热心地为国家利益执行所托付给他的任务。”

同年，他还对代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将军说，“我虽然尚未受知于勋爵阁下，但早已久仰勋爵大名，并深深钦佩阁下为英皇陛下在世界各处所立下的功勋。勋爵大人幸勿误会我在奉承。尽管我极敬仰阁下的人格和地位，我却毫无谄谀之意。卑职的性格一向是诚实朴素的。”

“至于卑职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则卑职当早已升迁。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诚恳和度量，当不致徒作空言。”

但华盛顿并没有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发迹，他的唯一手段就是努力苦干。这一点对他后来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后的治军心态很有关系，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所以他严格执行了以功论赏的办法。华盛顿作为司令和总统，从来没有干过走后门和拉关系这样的不正派事件，举例说，华盛顿的弟弟们从来没有因他的关系获得一官半职。

1758 年,他在他本县获选议员,而且又订了婚,所以准备辞军职以成家。但手下的军官们联名上书，力求挽留。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失去那么能干的司令、诚恳的友人和亲切的同伴，其失望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当我们想到我们不幸的国家所将受到的同样无可补偿的损失时，我们心中的悲哀更无可掩饰了。我们国家哪里去找更有军事经验、更富于爱国心和勇气、更有操守德行的人呢？阁下一天在职，就能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决心与热忱，不顾一切危难艰辛，在我们所敬爱者的领导下，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封信证明华盛顿对部下的确拥有真实的威信。如果一定要抓辫子，倒也有一个。那就是他痛恨无纪律的士兵，特别是开小差的人。他曾绞死了 2 名逃犯，并对另一些开小差者施以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打。但即使在他任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也始终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开小差问题。

家业兴旺　得思兼善

中国的农民革命似乎有一条规律。农民总是被剥削得没吃没穿,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不能不反。美国的革命却是另外一种情景。领导革命的人几乎都是丰衣足食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士绅。

著名的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来美国革命的目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目的，是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剥削。而奴役的定义是：强迫我做我没有同意的事。

华盛顿于 1758 年底辞军职,1759 年 1 月与富孀玛莎·寇蒂斯结婚。华盛顿本来已是一名富翁，他的妻子现在又带来了 17438 英亩土地与 4.5 万英镑现款（其中一部分属玛莎前夫所生的子女)。华盛顿一生都没有生育,他把玛莎的儿女当儿女,但玛莎的女儿 10 多岁就死了，儿子也只活到 30 多岁。就这一点言，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有个别历史学家却说，因为上帝要让华盛顿当全国人民的父亲，所以没有赐他以儿女。

既然如此富有，华盛顿的生活当然是相当豪华的，不但是黑奴满堂,而且骏马满厩,宾客满门。

不过，华盛顿决不是财迷心窍。应当说他是一位乐善好施者。这儿有一封他 1769 年 1 月 29 日写给一位穷朋友的信,很有意思：

亲爱的先生：最近一再听到你称赞泽西学院，好像

你有意将你的儿子威廉（听说他年轻好学，愿意终身从事学术工作，这一志向不仅可促进他本人的幸福，而且还可为别人造福）送往该院学习。如果你不反对，我将乐于负担他的教育费用。假如你能尽快在你认为方便的时刻送他上学，我可每年资助 25 镑现行货币，直到他完成学业。如果我能活着看到他学业的完成，规定的数目将按年付给。如果我在此期间去世，此信将使我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承担义务，按照本信的意旨行事。此项资助不指望也不愿意得到偿还，唯一的希望是接受者和资助者一样，都是出自好意，无拘无束。你也不要从施恩的观点来看待或提及此事。请你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张扬的。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还要去西部开拓，他要到宣告线以西去搞土地投机，投机这个词在中文只有贬意，但在那时的美国，Speculation 还带有冒险精神的含义，包括富兰克林，也是搞土地投机的。

宣告线是 1763 年国王宣布的，它不许殖民地人民超过宣告线圈土地。但华盛顿在 1767 年 9 月给了他朋友克劳福德一封信，请他在线外搞土地，信中说："我建议和你共同去取得某些最有价值的土地。……我要说句私房话，我认为那条线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按 1754 年时，丁惠迪曾答应给边防军 20 万英亩作奖励，华盛顿在 1769 年终于想法圈到了这 20 万英亩，他本人以上校资格分到 1.5 万英亩，并且又从别人手中购进 5600 英亩。

这样一位大地主为什么要革命？有些评论家认为华盛顿的财富来自农产品，对英国而言，他要吃剪刀差之亏，所以他要革命。

不错，华盛顿是要在农产品上吃亏的，但这种亏他吃之甚

久，他在这方面的抱怨虽然不能成书，但大概可成小册子。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革命，甚至 1773 年波士顿毁茶派倾倒茶叶时，他还表示不支持毁茶活动。

华盛顿的革命思想是从参加政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他的世交费尔法克斯家族是保皇派，他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革命思想，但他的政治朋友如乔治·梅森等却是‘左派”,他经常与他们接触，同时也经常获得来自北方的信息。于是，争取自由的思想逐渐进入了他的脑袋。

有一些信件可以证明华盛顿之反英主要是出于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剥削。

1769 年 4 月 5 日，华盛顿在给梅森的信中说：

> 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事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
>
> 为了保卫与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这就是我直截了当的意见。但我想补充一点,即武器……应该是最后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向国王请愿,向议会陈诉,据说都已无济于事。抵制他们的商品，断绝他们的贸易，能在何种程度上使他们回心转意,重视我们的权利,尚待一试。

1774 年 7 月 20 日，华盛顿在给他的保皇派朋友费尔法克斯信中说：

> 亲爱的先生:关于以何种方式击败(废除)这一遭到激烈抨击而且应该遭到抨击的法案，你我的意见有很大分岐，这一点我将毫不犹豫地承认。

……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 3 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一直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顺恭敬的方式向英皇陛下请愿。不仅如此，我们还曾按两院不同的法律职能向上、下议院申诉，说明作为英国人，我们宪法权利的最根本及最宝贵的部分不应被剥夺。既然我们现在所反对的就是这种课税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想，现在行使这种权力不会像以前那样令人憎恨呢？

如果我对大不列颠国会是否有权不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课税一事还有所怀疑不敢肯定的话，我将欣然同意你的意见，即请愿，而且只有请愿，才是唯一可行的获得救助的道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只是乞求恩惠，而不是要求权利。这种权利，按我的看法，是自然法和宪法赋予我们的毋容置疑的权利。照你的想法，我还会把超过请愿的任何步骤看作犯罪；但你这种想法，我一点也没有。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随便掏钱，正如不经你同意，我没有权力把手伸进你的衣袋里去随便掏钱一样。殖民地各州已经用一种坚定而庄重的方式向他们阐述过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的“正义”有所期待呢？

1771 年 1 月 1 日，华盛顿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等人信中更说得清楚了：“我将时刻记住，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才拿起武器；一旦获得自由，首先要弃置不用的也应该是武器。”

临危受命　鞠躬尽瘁

第一次大陆会议是 1774 年 9 月召开的，那时战争尚未开始，大会只是向英王提了请愿书。第二次大陆会议于 1775 年召开，大会正在开会之际，快骑传来了列克星敦爆发武装冲突的报告，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样，殖民地军队就需要一名总司令。

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马萨诸塞州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堂兄弟认为，司令应当由弗吉尼亚人担任。这一方面是出于南北团结的考虑，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一个殖民地，人口和面积都占第一。

华盛顿是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之一。亚当斯兄弟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据亚当斯在日记中叙述，督促代表们作出决定的功劳在于他。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简要而诚恳地说明了情况的危急性，接着动议应由大会接管坎布里奇的军队，并任命一位将军。他说“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位先生适合于担任这个重要指挥职务，他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先生，他现在就在大家当中，而且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才能和整个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并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胜过全邦联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这样，华盛顿于 1775 年 6 月 15 日被大会推选为陆军将军兼总司令。

6 月 16 日，华盛顿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议长先生：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所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但我仍感到很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我的军事经

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对于他们批准任命时杰出的证词，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为了避免误解，损及我的名誉，我请求在座的诸位先生记住，今天我在此诚心诚意地表明我认为自己不配享有给予我的荣誉。

至于待遇,先生,请允许我向议会表明,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我也不想从中牟利,我将把一切开支如数入账。我相信他们会给予报销，这就是我的希望。

这里明显地看出，华盛顿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会当司令；他在接受此职时坚决不接受“支薪”，也就是说，他是纯粹地为国家服务。

6 月 18 日,他写信给妻子说：

我最亲爱的 此际我正写信给你,要谈的事使我满怀难以言喻的忧虑。当我想到你将为此感到不安时，愈感忧心如焚。大陆会议已决定，为保卫美利坚事业所征集的全部军队，将由我指挥，而且我必须立即前往波士顿接受这一使命。

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岁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从事军役似已为命中注定，我希望，承担这一任务是天意要我达到某种良好的目的。从我的信中你想必已经看出我所担心的是无法摆脱这一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务，故未率然通知何日归来。原因即在于此。不接受这一任命，又要我的人格不受非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拒绝就会使我蒙受羞辱，给我的朋友带来痛苦，我相信这不可能，也不应该合乎你的意愿，而且必然会大大降低我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我只有寄望于天命。我一直得到上天的慷慨仁慈的保佑，毫无疑问，我会在秋天平安地回到你的身边。战争的辛劳或危险不会给我带来痛苦，但一想到你一个人留在家中忧虑不安，我就感到难过。请求你务必要拿出你的全部毅力，尽可能过得愉快些。再没有什么比得知这一切，而且从你的亲笔信中得知这一切，能更使我感到欣慰了。我最真挚而热切的愿望就是你能妥善地安排生活，使自己心平气和，尽可能保持宁静，要是我得知你对我确实无法推卸的一切感到不满或有所抱怨，那只能使我更加不安。

生命总是无常的。趁着头脑清醒，心情平静，在力所能及时料理一下眼前的事务，每个谨慎的人都会认为是有必要的。我一到这里（因我离家前没有时间）就请彭德尔顿上校按我的口授为我起草了一份遗嘱，我现随信寄去。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

就此搁笔，我还有几封信要写，盼代我向你的朋友们问好，并请你放心，亲爱的帕齐，最真诚的问候。

华盛顿没有上战场，就已经先立下了遗嘱，仅此一端，可见他的牺牲决心了。

6月 19 日，他又给朋友巴西特上校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正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从此以后一路上可能再找不到友善的港湾。殖民地的同胞

们一致要求我担任大陆军的指挥。接受这种荣誉并非我所向往，摆脱这种荣誉才是我的心愿。这固然因为我不愿离开我那平静的家庭之乐，也由于我深知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但是议会的偏爱，加上某些政治动机使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愿上帝保佑，我接受这一职责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不会由于我的无知而有损于我的名誉。我可以在这三点上做出保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如果这些都不能弥补能力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失败之虞，我个人的名誉也会扫地以尽。因为荣誉孕育于胜利之中。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我现在的地位决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和手腕。因此，倘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竭尽所能，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也会泰然自若,心安理得。

据另外有一个故事说，华盛顿在被提名为司令后，马上哭丧着脸对同僚帕特里克·亨利说:"我知道,从这一天起,便是我一生名誉低降和毁灭的开始。"

华盛顿的确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孙武子，不是拿破仑，更不是毛泽东。他算不上是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今天美国盛行"教育总统""人权总统"一类名称,因此,华盛顿倒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品德总司令"。华盛顿依靠他的高尚品德,带动了乌合之众的美国军队，终于打败了正经八百的英国正规军。

华盛顿总司令上任不久，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上层中间的人事纠葛，另一是在下层间的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譬如说,有一位约翰·托马斯,闹军阶问题,而有辞职之意，华盛顿乃于 1775 年 7 月 23 日给了他这样一封信：

先生，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深受国家、军队

信任的将领提出辞职，在我看来无论对国家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名誉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还未成为事实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最后的努力加以阻止。您的德性和您的理智则必须做出决定。……但是，在我们这个事业中，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既非耀武扬威，亦非开疆拓土，而是为了保卫个人与国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贵的一切。毫无疑问，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可以为国效忠的岗位，都应被看作是无尚的光荣。如果不出一个月，我们军队最高将领之间就龃龉不和，而为了解决不和必须全体离职，这对我们的敌人又将意味着什么样的胜利呢？如果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事业，那些微不足道的争论，不能服从整体的大利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夸耀美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这些话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美国的公民，而且你还是马萨诸塞海湾的一个居民。你本人的出生地和其它地区的美国人民，对于你的留任有一种特殊的、坚定的希望。依我看来，你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你至今为止仍然依奉的公德和荣誉的原则，那你是不能拒绝这个要求的。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那它就应该得到支持。假如我们那些德高望重、经历非凡的先生们都不能克服竞争中的偏见，在危急关头贸然引退，那我们的事业怎么能得到支持呢？先生，我承认，你的正当要求和所作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里，高尚的人都有理由作出同样的抱怨，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放弃公众的事业。他们以宽宏大量的精神压制心头的怒火，使得他们的敌人为自己的

不公正的行为而感到羞愧。难道美国举不出这样宽宏大量的例子吗？为了你那正在流血的国家——你为之献身的土地——你们要求的宪章权力——想想那些已经为国捐躯的勇士们，我恳求你从头脑中忘掉那些可导致怨恨和失望的情绪。你的祖国会对你的功绩作出公正的裁决的。……这个地区的士兵特别信任你，爱戴你——他们中间许多人不能理解你这一行动出于什么动机。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有权仿效你而弃甲归田，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而且是无可弥补的。根据军官、士兵间的个人关系，以及随着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我们有理由为此担心。

……对于您这样一个宽宏大量、谨慎周到的人来讲，这些考虑当然会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您的这一行动导致部队的分裂，如果美利坚的失败、毁灭归咎于您的明智和行为本可以阻止的那些措施，那您将怎样向您的国家和您自己的良心解释呢？

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大大忽略了这封信，信虽然是给托马斯的，但它所提出的要求却正是华盛顿本人作为军人所身体力行的道德准则。

直接与华盛顿闹意见的则是副司令查尔斯·李将军。华盛顿于 1776 年冬，在纽约打了一个大败仗，人员损失约 1/2，军需供应几乎全部丧失。幸亏英军统帅战略失误，没有紧追紧打，华盛顿得以率败军渡过特拉华河逃逸。为此，李十分瞧不起华盛顿，自以为他要比华盛顿高明。

不久，华盛顿多次令李率军南下助战，而李却置之不理，独自行动，结果竟在一次巡视中被英军活捉。英军乃得从容地占领了美方首都费城。华盛顿也只好率残部扎营于离费城 20 多英里

的福奇谷。

最后，通过交换战俘办法，李将军被交换了回来。华盛顿毫不责备，仍任他为副司令。1778 年，费城占领军出于战略考虑，自动撤回纽约。华盛顿令李率 5000 人乘机追击。6 月下旬的一天，华盛顿认为李已经开始攻击，他骑马往前线去观察，却碰到一些正在撤退的士兵，询问之下，获悉李已下令后撤，华盛顿不能控制自己,突然暴怒,他找到李,令他回去,华盛顿自己召集队伍,进行追击。但英军以快速撤退,只被消灭了一些殿后士兵。华盛顿原定的阻击计划宣告失败。

事后，李不但不承认错误，还自诩保全了美军实力。他说他若作战，美军势将被击溃。军事法庭判定李犯了不服从命令之罪。但李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华盛顿。

1779 年 7 月 29 日，为李的事华盛顿写信给约瑟夫·李德说：“如果我曾以军事天才或经验丰富的军官自命，如果我曾经打出这样的招牌以取得我所荣获的司令职务，如果我就任以后专横独断，自以为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挫折是由于我的固执与失误，我不仅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他的鞭笞或其他作者的谴责，也应遭到世人的唾弃。但众所周知，司令职务是以某种方式强加于我的。我接受任命，纯属勉强。因我深知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的局势错综复杂，进退维谷，以我的才能与经验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实感力所不胜。我并未作过多的承诺，而我所作的承诺都已一一履行。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认为我是他高升的障碍，我可郑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归田，重享家庭的闲逸与幸福。我一切努力均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且，为此目的役力劳心,已 4 年有余。惟既已从事军役，但求有利于国家。虽历经颠沛,往往非常人所能忍受,因此无日不以此自勉。”

1777 年 10 月,美军在萨拉托加大败英军，迫英军全部投

降。富兰克林一直在巴黎要求法王路易签订法美同盟条约，路易一直迟疑不决。但在萨拉托加消息传至巴黎后，路易乃下了决心，签订了同盟条约，而这一条约成了奠定美军胜利的不可少的基础。

不幸的是，萨拉托加的胜利却给华盛顿带来了节外生枝。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小撮人，见到霍勒斯·盖茨将军取得萨拉托加胜利后，阴谋拥立盖茨来替代打败仗的华盛顿。有人将这一阴谋告知了华盛顿，盖茨十分恐慌，乃写信给华盛顿进行解释,并连续写了几次。

1778 年 2 月 14 日，华盛顿在福奇谷给了盖茨这样一封回信“先生,本月惠书昨日收到。我厌恶不亚于任何人。要不是我被迫参与这场争论的话，你是永远不会有机会指责我有丝毫爱争论的倾向的。既然你一再郑重声明你在我们来往信件所讨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见解，我也愿意结束这一争论。我也像你一样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情，并且只要今后情况允许，就永远予以忘却。我的脾气是要同所有的人和好，和谐相处，我特别希望避免与那些同我一样为崇高的国家利益奋斗的人发生任何个人不和或分歧，因为一切这样的分歧，其后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

盖茨在萨拉托加之功，有一部分是他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偷他人之功为己功。华盛顿心胸宽阔，在争论后仍信任盖茨，但后来盖茨在卡姆登一役中，竟不战而逃，把全军置于不顾，为美国军人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当然，华盛顿的更多精力花在整顿军队纪律之上，他认为美方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军才能战胜英军。他一直为此而奋斗。他在福奇谷接待了一位来自普鲁士的军人斯托本男爵，是斯托本把华盛顿的散漫士兵训练成一支具有正规军纪律的可用的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